

# 主播经纪不得带头打赏 挤掉直播水分

□ 朱昌俊

为加强网络表演行业内容源头管理，进一步明确平台、主播、经纪机构三方关系，文化和旅游部于近日发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不得以打赏排名、虚假宣传等方式炒作网络表演者收入。意见稿指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应当加强对签约网络表演者的约束，要求其不得以特殊对待、语言刺激、承诺返利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

统计显示，2020年中国在线直播用

户规模为5.87亿人。且预计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增长，到2022年，直播用户有望达到6.60亿人。不过，这样一个国民级行业，其中的乱象并不少见。此前有媒体调查发现，网络直播中，为获得打赏，主播开竞猜局引导粉丝下注、相互比拼所获礼物、无下限互动、卖惨博同情进行网络乞讨进而获得礼物等乱象层出不穷。在网络直播体系中，经纪机构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他们才是网络主播背后真正的玩家。可以说，网络主播在台前的表现，不管是具体的人设、形象包装，还是与用户的互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经纪机构的指挥。因此，规范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确实是加强网络表演

内容源头管理的重要一环。

这次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算是一种针对性纠偏。在直播平台的算法中，主播获得的礼物越多，被推送的机会越大，就越容易被粉丝发现。正是看到这一激励机制，不少经纪机构为了钓大鱼，不惜放长线，即使会被平台分利，也常自刷礼物或让合作方当托儿。如此通过自导自演的方

式，让直播间的礼物和粉丝变得真真假假，进而增加了网络直播行业的水分。长此以往，这种虚假繁荣必然为行业的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此前一些带货主播被曝退款率超七

成，它的背后也有着同样的病灶，都是通过数据注水的方式来实现获利最大化。只不过，一般的表演经纪机构或者请托儿，打赏是为了带节奏，引导用户送礼物，而带货主播背后的经纪公司想方设法刷流量，则是为引导用户购买，或提升带货主播的坑位费。因此，不管是网络表演还是网络带货，规范其背后的经纪机构行为，都显得非常重要。

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带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则是容易让一些青少年入坑。近几年，未成年入巨额打赏主播事件时有发生。众所周知，未成年人在接触网络直播时，属于最容易受到诱导的

群体。很显然，经纪公司和主播的诱导消费现象越突出，它对于未成年人的伤害也就越大。从更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对于经纪公司的诱导消费行为也应该予以严格规范。

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到的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不得以特殊对待、语言刺激、承诺返利等方式诱导用户消费等，都是指向一种原则性要求。它具体如何落实，还有待现实检验。像如何判定是经纪公司带头打赏，或就需要平台方面强化把关，提供数据支持。而如何界定特殊对待、语言刺激，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精准监督和约束，也有赖于建立完善的配套执行机制。

## 公益开放公共数据 让公众共享数据红利

□ 杨鑫宇

近日，在上海召开的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据要素论坛上，上海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戴柳发表了数据立法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基本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当前公共数据的开放与用户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公共数据开放的种类和总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明显，开放的规则不够完善，缺乏安全追溯。（财新网7月12日）

在公共数据管理缺少统一立法指引的现状下，戴柳的相关表述，既对公共数据的确权、开放与流转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也强调了公共数据的公共性，对数据管理者提出了社会责任层面的要求。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对公共数据的关注未必很多，也较少产生直接调用公共数据的需求。其实，我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随时随地都在形成数据，汇入公共数据的河流。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数据主要以统计和档案的形式存在，与个体的直接交集相对较少，而在互联网普及后，我们通过网络办的每一件事、付的每一笔钱、填写的每一项个人资料，都会留下痕迹、形成数据。发生在机构、集体层面上的社会活动，诸如商业交易、政策施行、仲裁审判等，同样对应着特定的公共数据。

中国有句形容税收的俗语，叫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公共数据这件事上，这个道理同样适用。有关部门管理的公共数据，虽然不是从公众手中以义务的形式直接征收上来的，却是公众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即便是那些由政府活动产生的数据，其源头也是由纳税人缴纳、用以支持政府运作的税款，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因此，不论是公共数据的调用与存取，还是对公共数据的分析、加工、二次利用，都应尽可能以公益的形式向社会大众开放。

作为公共数据的收集者与管理者，有关部门通过这些数据掌握了社会动

向，获取了行政工作上的便利。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公众自然有权享有数据红利，建立一套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免费地获取公共数据的系统，是有关部门理应承担的责任。建立这样一套系统，必然需要有关部门付出人力、财力上的成本，但是，与这些成本对应的收益，早已体现在了有关部门对公共数据的利用中，没有理由进行收费。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就公共数据管理工作订立全国性的统一规范，因此正如戴柳在演讲中所言：公共数据的开放与用户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公共数据开放的种类和总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明显，开放的规则不够完善，缺乏安全追溯。不过，包括上海、深圳、浙江等地在内，已有多地先行展开了地方性规范的制定工作。

其中，2019年发布的《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规定：对于无条件开放的数据类别，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通过开放平台以数据下载或者接口调用的方式直接获取。今年7月7日刚刚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则进一步明确：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开放公共数据，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从这些地方性规范的表述来看，以公益、免费的方式依法开放公共数据，正在逐渐成为政策领域的共识。未来，国家还应致力于将离散于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公共数据统筹起来，建立统一的开放标准，如此才能让公共数据彻底公共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数据虽然应以共享为原则，但共享并不是无门槛、无限制的。不共享为例外中的例外，同样值得重点关注。一般而言，不宜共享的公共数据包括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导致意外泄密的，就是个人隐私。长期以来，都有人对日趋数据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感到不安，这种不安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对个人隐私的担忧。有关部门在管理公共数据时，如果不保护好民众的个人隐私，便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让公共数据受到居心不良者的利用。对此，数据管理者必须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把握好公共数据开放的合理尺度，真正把这件事做好。

## 一哄而上设热门专业 偏离了大学的定位

□ 熊丙奇

7月9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了《关于开展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组织开展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工作，要求各高校主管部门支持高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设置符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专业。其中，教育部特别要求高校主管部门加强工作指导、预警和预测，避免同一区域（领域）大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做好专业布局结构宏观调控。

从目前来看，部分高校并没有形成自身明确的定位。部分综合性大学过于短视，把某些基础学科专业砍掉，盲目追逐热门，也有部分专业导向的院校不安于自身定位，强行追求高大上，最后既耽误了学校发展，也耽误了学生学习与成长。

与此相对，也有一些高校，本身就更加侧重培养专业人，直接对接就业市场。这类高校设置专业理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灵活调整专业，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

目前看来，部分高校并没有形成自身明确的定位。部分综合性大学过于短视，把某些基础学科专业砍掉，盲目追逐热门，也有部分专业导向的院校不安于自身定位，强行追求高大上，最后既耽误了学校发展，也耽误了学生学习与成长。要让各个高校形成更加合理而明确的自我定位，不仅需要赋予高校自主权，更需要引导高校健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如此才能不把自主权滥用。学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要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如此才能让高校办学质量得到实实在在的提



限高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要求，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确需建设的，要结合消防等专题论证进行建筑方案审查，并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备案；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人民网7月11日） 漫画：徐简

## 强掳女子上车 写份保证书就完事了？

□ 欧阳晨雨

如果不是一段监控视频公之于众，人们恐怕不会相信，朗朗乾坤之下，竟然有人敢做出这种明目张胆的强掳他人行为。据极目新闻报道，7月9日凌晨，广西钦州灵山县，一辆白色轿车突然转弯停在一白衣女子面前，随后，男性司机下车将女子拖入车内。女子奋力挣扎并高声呼救，幸得热心市民搭救，施暴男子随即离开。事后，记者从灵山县公安局了解到，女子与男子系前男女朋友关系。事发后，经警方调解处理，女方表示不追究对方责任。另据四川观察的报道，当事女子发文回应此事，称前男友已在派出所写保证书不再骚扰，感谢帮助她的陌生人。

一则闹得沸沸扬扬的法治新闻，不应仅以一纸保证书落幕收场。从法律上看，强掳他人上车，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已经触碰了法制的高压线。公民的人

身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宪法中白纸黑字规定的基本权利，并不是挂在墙上的摆设。

回看监控视频，在男方持续1分多钟的暴力劫持中，女方一直在激烈反抗，身上还留下了明显的伤痕，如果不是其他市民出手干预，当事人恐怕已经被塞进轿车带走，后果不堪设想。根据刑法的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便够不上犯罪的档次，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规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就情节较轻的，也得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法治社会，有些事可以私了，有些事不能私了。根据法律规定，派出

所居间调解的确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范围多限定在民事领域。在公共场合强掳他人，不是小孩过家家，施暴者需不需要追究责任，需不需要接受制裁，应该由法律说了算，而不是由受害人和被受害人一起表态就能轻轻揭过的事。

诚然，该男子和白衣女子之间是前男女朋友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施暴者消灾免责的挡箭牌。我国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侵犯人身自由，无论身份如何特殊，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是父母，也不能非法拘禁自己的亲生儿女，遑论所谓的前男女朋友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公民不受任何暴力非法侵犯，是在国家力量严格保护之下的自由。如果这类事件可以轻易私了，必然削弱法律对不法分子的震慑作用。唯有妥善处理此类事件，尽最大努力为受害者撑腰，让滥用暴力的人付出代价，才能给公众吃下一颗定心丸，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实现 四治联动

□ 马亮

肺炎疫情凸显了基层治理的至关重要性，但是也暴露了基层治理的短板和不足。基层组织的数量庞大，基层治理的牵扯面广，基层工作者的负担很重，这些都使基层治理挑战重重。如果基层组织依然是上级党政部门派交权责事项的兜底保障，如果基层工作者依然依赖人海战术开展工作，如果基层治理不能走出一条新路，那么就很难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要求。

力建设，特别是增强乡镇（街道）的行政执行能力、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平安建设能力。能力建设意味着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向基层放权赋能，并减轻基层负担。当前基层治理的人才荒问题值得高度关注，而这是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一方面，基层组织留不住人，编外人员想转为编内，编内人员想考到上级；另一方面，上级部门以各种理由抽调借调基层核心骨干人员，使基层人力资源进一步捉襟见肘。因此，上级党政部门不能凡事向下伸手，而是要把财力、权限和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和调剂使用。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使基层成为一个人人向往的工作单位，而不是一个来了就想走走的过渡单位。

《意见》提出，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社区一词可以翻译为共同体，而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概念意味着基层不唯是行政机关主导一切，而是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都能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成为基层治理共

《意见》创新性地提出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要求基层治理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并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就难以走出当前的基层治理困境。因此，要加强党建引领作用，增强基层组织的各方面能力，并吸引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与此同时，基层治理要平战结合，既要能够适应常态化治理要求，也要增强应急管理。基层政权是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其能力高低直接决定了基层治理的水平高下。《意见》强调要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

自由谈

马亮